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曾纪泽



翻开中国近代史册，在那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曾涌现出众多的爱国志士、民族英雄，他们的事迹已被广为流传。青少年朋友，你们知道吗？在他们当中，还有为了捍卫国家利益，在充满剑拔弩张气氛的谈判中，不懈抗争的爱国志士，而曾纪泽就属这样一位。他是我国清朝末年卓越的外交家。

一、严格的家庭教育

曾纪泽，字劼(jié)刚，湖南湘乡人，出生在鸦片战争爆发的前一年——1839年。曾纪泽的父亲是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曾国藩。在他出生时，其父已是进士，入翰林(官名，清朝设翰林院，一部分在科举考试中中了进士的人可入翰林院)。曾家书香门第极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所以曾纪泽不到四岁半就入私塾(shú)，师从湘中名士冯树棠，开始习读经史诗文。

对于曾纪泽的读书、写字以至做事、做人，曾国藩都有谆谆教诲，严格督导。比如读书，曾国藩告诉他“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他还为曾纪泽选择了除《四书》、《五经》外必须熟读的若干种书籍，其中尤为要熟读的有《史记》、《汉书》等。关于读书的好处，他教诲曾纪泽“陶写性情，则一生受用不尽。”为了让子女用心读书，曾国藩提出“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至嘱！”

曾纪泽喜欢写字，他摹写的书法习作，多次受曾国藩好友的称赞。曾国藩亦对他提出，写字“既要求好，又要求快”。并以自身“因作字迟钝，吃亏不少”作为一耻，鼓励曾纪泽多写多练。“若一日能作楷书一万，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则手腕毫不费力。”字写得又好又快，对人的一生会有很大的用处，曾纪泽从小就受到父亲这样的教育。

曾国藩要求曾纪泽做事情必须“有恒”，也就是说要有始有终，只有这样才能有所成就。至于做人，更是严格要求他不能犯世家子弟最易犯的“奢”字和“傲”字。也不希望他将来做大官，希望他做个“读书明理”的人，而且要“勤俭自持，习劳习苦”，不能奢华懒惰。

由于家规严格，加上曾纪泽本人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所以他诗文书画俱佳，以后又自学英文，成为清末著名外交家。

曾纪泽年轻时两次到京城应试都落了榜。他也曾因不能通过科举考试而心中闷闷不乐，而一想到他父亲的教诲：“或中或不中，无甚关系”而应“以后穷经读史……光阴难得，一刻千金！”也就慢慢从低落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历史上有才华而未通过科举考试的人很多，只有勤奋学习，并有一颗报效祖国之心，就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从此，曾纪泽放弃了科考，潜心钻研对社会有用的典籍。他除了研读经史诗文外，还学习天文、地理、数学、音乐、骑术等，成为了博学多才的人。

二、研究西学，步入外交生涯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再也保持不了闭门锁国的状态，西方的商品和文化借助洋枪、洋炮的力量涌入中国。看到西方列强国力的强大，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地主买办阶级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创办近代的军事工业，从而掀起了一场洋务运动。自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创办了江南制造

局后，洋务派创办的局厂逐步增多，需要大量掌握近代科学和技术的人材，于是选派文武学员分赴欧美学习，并购置新式枪炮和铁甲兵船，以增强中国陆海军备，所有这些都对多年追随其父的曾纪泽产生了巨大影响。

起初，曾纪泽对西洋的物品很感兴趣，收藏有西洋的寒暑表、望远镜、照像机、洋棋、八音匣等。有时客人来访，曾纪泽便将收藏的物品展示于人，并一一讲解。不仅使客人大开眼界，也使曾纪泽从这些小物品上，一次次感受到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和中国技术落后的强烈对比。有一次，他的母亲突然得了重病，被英国人马格里用西药治好了，使他对西方的医疗技术有了新的认识。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广泛阅读欧洲的各种书籍，包括数学、物理、医学、化学等学科。对西方科学的广泛涉猎，使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到中国要富强，必须改弦更张，学习西方科技。他不满当时守旧的人士，一味地死守传统的经儒学说而拒斥西方先进技术，他认为：“先圣昔贤”的论述，云经典籍的记载已不能适应五千年来巨大变化，也无法解决今人面临的问题。他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没去过外国，更来不及研究当今世界的问题，对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只能由我们自己去研究。”

为了深入研究西学，探索中国自强之路，32岁的曾纪泽开始学习英文。当时中国人对西方社会了解很少，通晓西方语言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处理外交事务大多要借助于通商口岸的买办以及北京同文馆和上海同文馆出身的翻译，或者各国在华传教士。曾纪泽在当时是“以世家大员子弟而存志学习西方语言的第一人”。他的学习环境很不好，那时湖南境内精通英语的人才很少，曾纪泽只能采取自学的方式，手中常备英文字典，每天常读不懈。他学习英语很刻苦，从小其父教导的做事要“有恒”已深入行动之中。在他的日记中总是连日有读英文（有时还读法文）的记载。就是曾国藩去世，曾纪泽在家守孝的三年中也没有中断过。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学习，曾纪泽开始能用英文写作了，只因受环境限制口语不太准确。为了提高英文水平，曾纪泽与英国人马格里建立了密切关系，常用英文给马格里写信向他请教。以后在北京等待清政府委任职务期间，他与同文馆主持美国人丁越良常在一起研究欧洲政治、地理、历史，同时要求丁越良校正他用英文写的文章。艰苦的学习，换回了丰硕的成果，他成为人们赞誉的“通四夷之学，宏伟奇特之材”。

精通外文是做为外交工作的必要条件。曾纪泽后来出使英、法后仍然孜孜不断的学习，不仅可以用英文写作，英文交谈，译拟外交文件，甚至用英文写诗赠扇给外国友人。

曾纪泽的外文水平已经很高了，达到可以流利地与外国人交谈甚至发表演说的程度。但他并不炫耀，尤其是外交场合，他非常慎重地使用外语，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比如1878年9月驻法公使白罗尼来访，由于彼此的礼仪风俗不同，许多问题白罗尼带来的翻译无法解释清楚，曾纪泽才用英语加以说明，使双方的意思得以表达清楚。至于在正式的外交场合，他主张多多利用翻译进行传达。为什么要这样做，在曾纪泽离京赴欧前表明过他的观点：“即使语言已懂，亦候翻译传述。一则朝廷体制，应该如此；一则翻译传述之间，亦可借以停顿时候，想算应答之语言。”可见曾纪泽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很谨慎。

曾纪泽从小国学基础打得好，长大后又广泛涉及西方文化，精通外语，是清朝少有的学贯中西之人，他对如何认识中国文化与西学有着独到的见

解。他认为学外文必须先“通华文”，只有精通中国的文化，才能掌握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才能成为有民族气节利于国家的人材，如果“专攻西学，不通华文，鉴其貌则华产也，察其学术情性，无异于西洋之人，则其无益于国事”。对于有学识有民族气节的人不学外文，他认为也不应该，那样“一旦有事，朝廷不得贤士大夫折冲尊俎（zǔ）之才而用之，则降而求诸庸俗狙（zhuā）佞之间，礼义诗书无闻焉，唯货利是视。”这意思是：一旦朝廷有事，得不到有学问品德好的，能够在谈判中制服对方的人材，就会寻找那些庸俗的只会做买卖的人，这样的人不懂礼义诗书，唯利是图，极不利于国家外交事务。从这些话里我们可以看到曾纪泽的一片爱国之心。

曾国藩在世时，不希望儿子从政，曾纪泽恪守父训，年轻时大多时间在军营随侍父亲。至直他父亲调任直隶总督，才得入京应荫生的考试，获得员外郎之职，分在户部。但当差不久，因他父亲患病，需要他照顾，即请假离京，未能就任该职。其后曾国藩调回江南，曾纪泽又随侍到两江。1872年曾国藩病逝，纪泽在家守孝三年。三年之后，曾纪泽再次来到京城，补授太常寺少卿（掌管祭祀事务），开始从政。1878年8月，曾纪泽继郭嵩焘出任中国驻英、法公使（1880年后又兼任驻俄大臣），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和外交生涯。

曾纪泽出使英、法的任命发表后，各国驻华使节和在华洋人对他进行了评价。美国公使何天爵向美国国务卿详述了曾纪泽自力学习英语的经过：“据我所知，他实在是清廷高官中唯一学习外国语文的人。他在丁忧（父母之丧）家居的时候，已专力攻读英文，虽无师授，却很有进步，现在已具相当基础。”他还强调：“我认为是最适宜的一项选择，对于未来的中外关系，必有良好的效果。”丁越良也说曾纪泽虽然外表随和，体格羸弱，但性格和胆略都极稳而卓越。此外，曾纪泽的精通英文，对他以后从事的外交事业，极有帮助。英国在华官方性质的《北华捷报》特别发表社评，认为“曾侯之被派使英，实为最佳人选”，又说“就他个人的业绩而言，他固然尚无表现，但从他温婉率真的性格来看，可以预料，他将能成功地应付未来的难题”。

可以说各国对曾纪泽出使英、法反映很好，但这并不妨碍在以后的外交事务中，曾纪泽为了中国的利益与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从1878年到1886年，在曾纪泽八年半的外交生涯中，主要进行了三次重大的外交活动，即签订中俄伊犁改定条约的谈判；中法越南问题交涉；中英鸦片加税免厘谈判。在这几次重大外交活动中，充分显示出曾纪泽的卓越外交才能，拳拳的爱国之心和不畏艰难的精神。特别是中俄伊犁改定条约的谈判，最艰苦，也是他面临的第一次重大考验。

三、沙俄争夺我国伊犁的卑劣行径

清朝末年，国势衰弱，内忧外患，危机重重。国内，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严重地动摇了清朝统治者的政权。外部，以英、法、俄、美等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浪潮，他们通过侵略和签订不平等条约，强占中国的土地，划分势力范围，妄想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沙俄是最早的侵华国之一。早在17世纪初叶，沙俄就开始觊（jì）觎（yú）我国西北边疆，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国加入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列，以武力威胁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攫（jué）取了一系列权益，割占了中国

大片领土，仅 1860 年的中俄《北京条约》、1864 年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就吞并了中国西部 44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沙俄并不满足，把侵略矛头继续指向我国新疆南部，并于 1871 年占据边疆重镇伊犁。

沙俄之所以急于想吞并我国西部和新疆等地有着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沙俄虽然是资本主义国家，但它与欧洲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生产力落后，俄国的工业产品没有力量与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品竞争，而只能在经济落后的东方，特别是包括中国西部地区的中亚细亚地区才能找到销路。第二，中亚不仅是沙俄商品的倾销地，同时也是巨大的原料基地。俄国纺织业兴起后，在其工业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而纺织业所需要的棉花长期向美国进口。一但有任何情况，就会影响双方贸易，进而影响纺织工业的发展。中亚是著名的棉花产地，同时与俄国接壤，运费低廉，这一切都驱使沙俄政府吞并中亚。第三，英、俄在中亚的争霸愈演愈烈，促使俄国迫不急待地占领伊犁。

早在 19 世纪上半叶，英国便企图从印度和波斯湾向中亚渗透。而沙俄在 1864 年占领了通往我国新疆南疆的必经之地浩罕，后来又宣布浩罕并入俄国。几乎在同一时间，浩罕的统治者得到新疆一个封建主的军事求援消息，便派阿古柏率军队去支持，而阿古柏在 1867 年基本控制了南疆后，自己登上汗位，宣告成立“哲德沙尔国”。阿古柏政权同时得到英、俄两国的支持，俄国还同阿古柏政权签订通商条约，双方互利。但阿古柏虽然与俄国勾结，却并不唯命是从，俄国为了控制阿古柏，经常对他进行军事威胁。事情的结果却是阿古柏转而求助于英国，与英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来对抗沙俄的巨大压力。而英国也力图通过操纵阿古柏，把南疆纳入英国势力范围，英国对阿古柏采取种种拉拢手段，诸如：派使者进行“友好”访问，赠送枪支弹药和物资，英国女王接见阿古柏等，促使阿古柏与英国关系更亲密，在双方签订的通商条约中，英国获得了比俄国更多的利益。英国与阿古柏的关系日益密切，阿古柏得到英国的扶持，势力日渐膨胀，虽然阿古柏政权还没有伸手伊犁，但已经引起了俄国政府的猜疑和嫉妒。

伊犁地区由九座城镇组成，其中最远最大，是伊犁的军政中心。整个伊犁地区气候宜人，土地肥沃，雨水充沛，物产丰饶，集市贸易发达，是我国西部边境的一块宝地。沙俄政府早就盯住这个地方，因为伊犁是沙俄从中亚进入我国新疆北部的大门，战略地位、商业地位都很重要，沙俄视它为嘴边的肥肉，岂肯让它落入他人之手？于是 1871 年俄国派兵向伊犁进犯，到 1872 年已经占领伊犁地区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西北边疆出现危机，是否应进兵新疆收复失地，清政府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左宗棠力主收复新疆、清廷采纳了他的意见，派他出兵新疆。1876 年左宗棠率军出关，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清军在当地各族人民的支持配合下，势如破竹彻底平定了阿古柏叛乱，阿古柏兵败势穷，走投无路，服毒而死。尔后，左宗棠率领军队长驱直入开进南疆。英、俄两国欲把南疆变为殖民地的幻想化作泡影。

自 1871 年 5 月，沙俄攻占伊犁后，清政府多次要求沙俄归还伊犁，沙俄开始曾假惺惺地表示：俄国只是代替中国守卫边疆，一旦中国军队收复了南疆，俄国就归还伊犁。他们认定清政府永远也收复不了南疆，做着永远霸占伊犁的美梦。后来沙俄又凶恶地提出：“若要交还伊犁，必须修改《勘分西北界约记》所划定的中俄两段边界。”

阿古柏叛乱平定后，新疆大部分土地已收复，唯有伊犁地区仍处于沙俄军队的非法占领之下，因此，收回伊犁成为国人瞩目之事。然而，清朝政府的软弱，清朝官员的无能，早已给各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沙俄因与中国接壤对中国的领土要求最热切，对于俄国熊已吞到嘴里的肥肉，让其吐出来谈何容易！

1878年，伊犁已被俄国侵占6年之久，清政府决定派一向认为很有外交经验的崇厚为钦差大臣与俄进行谈判。

崇厚曾担任过三口通商大臣，1870年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等职务，是当时中国派出的外交官员中职务最高的人。对崇厚的重用实在是个错误。虽然他在满大臣中号称精通洋务，有不少与外国人交往的经历，但他的才能平庸，没有过人的主张见地。两江总督刘坤一这样评价他“居官为人，畏洋人如畏虎”，曾纪泽认为他生性怯弱“善结主国之欢”，李鸿章也说他是“软弱无识”。一个人如果才能平平，但是肯于学习，刻苦钻研，就能够做个有益于国家的人。而崇厚才能平庸还不注意学习研究，连国际外交的一般法则，和外交运用方面的许多策略都知道得非常少，不仅如此，他还不肯吃苦，不接受有人提出的取道新疆、去了解当地的形势而后到俄谈判的意见。用这样的人去为中国争得利益，必然会失败。

崇厚到了俄国，俄国人对他采取又打又拉的手段，提高接待他的规格，允许他乘坐皇家马车，但时时又让他感到俄国的强悍态度，使他面对俄国人谈判就不敢坚持自己的立场。

1879年3月谈判开始，沙俄提出了割地、赔款、通商等苛刻条件。明明是他们无理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应当无条件归还，却还提出那么多条件。在持续半年多的谈判中，沙俄代表不断使用欺骗手段，逼迫崇厚步步退让。清政府曾多次训令崇厚“必当权其轻重，未可因急于索还伊犁，转贻后患”，但是崇厚没有放在心上，在开议之初，就擅自答应了与俄通商的一些条件和交给俄国代守伊犁的兵费。关于割地问题，清政府明确表示反对，但崇厚充耳不闻，对沙俄提出的各项要求“不牢察利害轻重，贸然许之”。1879年10月崇厚未经清政府的最后同意，在俄国的里瓦几亚与俄方代表签订了《里瓦吉亚条约》、《瑗瑀专条》、《陆路通商章程》。

这几个条约的签订，换来的仅是伊犁地区的首要城镇，而失去了中国更多的利益。条约规定：伊犁首城的西面和南面几百里地割给俄国。这里将首城通向南面的八个城镇的两条道路也割去了，首城成为弹丸之地，很难守住。条约还规定了中俄在新疆的南疆和北疆的边界都作了有利于俄方的修改；还规定了俄国可在嘉峪关、哈密等多处地方设置领事和贸易机构；并在蒙古和天山南北贸易不纳税；俄商的货物可以经过张家口、通州、西安等地到达天津、汉口；准许俄国人在松花江行船远到吉林内地；交俄国代守伊犁费用500万卢布。

条约的摘要寄回北京后，清朝官员无不震惊，中国用诸多的权益、土地、钱财换来的仅是伊犁地区的首城那弹丸之地！官员们群起反对，一向力主以兵力收复伊犁的左宗棠愤慨地说：“我得伊犁只剩一片荒郊，北境一二百里间皆俄属部”，“伊犁西南之地划归俄国，自此伊犁三面俄部环居，官军接收，堕其度内……虽得必失。”一向对外妥协的奕訢也认为此约丧权太多，不能接受“收还伊犁与不收同，或尚不如不收之为愈”。张之洞上奏表示：如果按照签订的新约办，得到的仅是伊犁两个字的空名，失去的不止新疆领

土二万里，认为“不改此议，不可为国”。

崇厚卖国丧权的行为激起了广大人民愤慨，已经到了不杀崇厚不足以警天下的程度，如果不治崇厚的罪，天下忠臣会为此而寒心。在全国舆论的影响下，1880年1月2日清政府决定将崇厚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3月份崇厚被定为斩监候，待秋后处决。

正在为取得巨大权利而欣喜的沙俄，听说清政府拒绝《里瓦吉亚条约》并将崇厚治罪恼怒起来，俄国驻华代办凯阳德来到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责问中国惩处崇厚“是何用意”，当时奕訢婉转地回答：这是中国的内政，与俄国没有什么关系。凯阳德听后不仅专横态度没有改变，反而暴跳如雷，说什么：此事对未来的中俄关系，将有直接的影响。就中国方面讲，崇厚是代表中国同俄国签订条约，就俄国方面讲，纯粹是为了中俄之间的友好才诚心诚意与你们订约，可你们却把订约的代表开除了，还要治罪，这不是让我们下不来台吗？

此番话真可谓滑天下之大稽，俄国要与中国“友好”，而且是“诚心诚意”，却侵占中国领土不说，还要中国拿出更多的利益去换取伊犁地区的一座城镇（共有九座城镇），这样的“友好”是世界任何国家和人民都不需要的。

可是清政府害怕与洋人闹僵，为了缓和紧张的情绪，两天后奕訢亲自赴俄国公使馆作解释。凯阳德再次搬出那套谬论：“俄国遇事每有和好之意，中国遇事每有阻拦之心。以前中国边界大臣办理交涉事件，俄国国家多不满意，适中国派钦差到俄，俄国以为中国有和好之意，将从前不满中国之处姑置勿论。”俄国本着与中国友好之心，才派代表与中方谈判，在谈判中“所让中国之处不少”，其中不少是俄国百姓以及欧洲舆论都认为不该让的东西，然而就是为了“友好”，我们才“特排众论，将不应让与中国之处全行相让，岂知愈让愈不见好”。简直就是一个强盗在向人表白他是如何的仁义，不过表白仁义之后还是暴露强盗本性，搬出了俄国惯用的伎俩，以战争相威胁说“俄国并非无力量，至条约准与不准，在俄国总是一样”。当时崇厚的处罚由革职拿问变成斩监候后，凯阳德马上表示要下旗返回俄国，断绝外交关系。这时在俄国彼得堡的驻华公使布策对中国驻俄使节邵友濂威胁说：如果中国真将崇厚治罪，则中俄关系将就此了结了。

沙俄认为外交方面的恫吓，还不是足以达到使清政府乖乖屈服，就开始向中国施加军事压力。1880年俄国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受命做好对华战争的一切准备。他将大批军队和枪支、弹药调往伊犁附近，驻防伊犁的俄军很快达到1.5万多人，比1871年至1877年驻伊犁的俄军总数还多六七倍。他们在这一地区修筑工事，构筑堡垒并铺设了一条军用道路，以便随时向东进发。考夫曼还致函给西西伯利亚总督，让他调集军队协同作战。不出几个月，协同作战的部队集结了1.2万多人，配备62门大炮。考夫曼仍感到力量不足，又亲自接见阿古柏的儿子，煽动他积极复国，协助他对华作战。中俄西部边界的情况如此紧张，东部边界也是充满火药味。沙俄紧急调运了大批军队“补充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海参崴的兵力。并计划增筑炮台于黑龙江西岸”。紧接着在远东海面，出现了沙俄军舰，沙俄扬言要封锁渤海、黄海，直接威胁北京。

沙俄对中国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一时间两国关系急剧恶化。面对沙俄的武力威胁，清政府不得不加强战备。命令左宗棠赴西北统筹战守；调直隶

军队到东北充实边防；由李鸿章统筹渤海到黄海的海防；并且整顿长江水师。中俄战争似乎一触即发。

四、受命危难——中俄伊犁改定条约谈判

中俄双方虽然都做了战争准备，但并非不存在以谈判解决争端之心。而且西方列强尤其是英国，害怕战火燃起会对他们国家在华利益造成损失。但是让中国接受《里瓦吉亚条约》，英国又不甘心，一向与俄国争夺在华利益寸步不让的英国，采取了暗中支持清政府修改《里瓦吉亚条约》以箝制俄国，同时压迫清政府不要“走极端”，通过对俄的让步以求和平解决争端。就这样，在西方列强，尤其英国的影响下，中俄两国确定了重开谈判，改订前约的方针。

清政府中了解国外情况又善长外交谈判的人才实在是凤毛麟角。李鸿章一向是清政府在外交事务方面重用的大臣，但他极力主张接受崇厚所签条约，不能委派。在出使外洋的官员中郭嵩焘资望最高，但因出使三年受到诬谤，归国后不问朝政。历史的重任就这样落到了曾纪泽身上。

曾纪泽当时任英法公使一年多了，以临事谨慎，不惧不燥，了解西方情况而著称。当他于1880年2月接到了清政府任命他为出使俄国的钦差大臣，赴俄谈判改定《里瓦吉亚条约》时，感到从未有过的巨大压力向他袭来。他深知担当此任的艰巨和处境的困难。

困难之一，《里瓦吉亚条约》使中国蒙受巨大损失，虽然清廷没有最后批准，但作为中国的谈判代表已签字，俄国沙皇已签字，并且俄国民众及其它国家都已知道。现在要废除不用，重新讨论，对一向狂妄自大的沙皇将是沉重的一击，使他感到受了侮辱，他岂能善罢干休。困难之二，英、俄两国一向表面友好而背后相互猜疑，两国在华利益之争越来越厉害。现在曾纪泽以英、法公使兼任使俄大臣身份前去谈判，凡事不顺利时，俄国人亦会怀疑是英国在背后指使，无形中增加了谈判的难度。困难之三，对于派曾纪泽出使俄国担此重任，清朝官员褒贬不一。有支持他的人，如左宗棠、张之洞，更多的是表示怀疑，如李鸿章认为派他去是“殊欠斟酌”。还有人甚至提出，曾纪泽平日与西方关系好，总是宣传西学，让他去谈判怎么能胜？只有杀了崇厚才能使曾纪泽畏惧。

面对来自各方的困难和压力，曾纪泽没有逃避，毅然接受了任务。他决心克服重重困难，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不辜负国家对他的重望。

伊犁改定条约的谈判是否能取得成功，谈判前的准备工作是关键的一环。曾纪泽将英、法公使的各项工作做了妥善安排后，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中俄谈判前的准备工作中。

曾纪泽首先仔仔细细地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俄、英、法三个国家对这件事情的态度。

俄国因前一段时间发动对土耳其的战争，虽然取胜但人力财力都有很大损耗。尽管它对中国作了战争准备，一般不会贸然发动战争。为了探听俄国的虚实，曾纪泽想方设法利用他在巴黎、伦敦的各种关系收集情报。他从伦敦政府官员那里得知，对已经签订的《里瓦吉亚条约》重新议订，俄国的内部有分歧：“布策诸人虽坚持各条不肯放松，而俄国皇帝与其外部丞相吉尔斯实有和平了结之意。”这是因为在中国的新疆，左宗棠手握重兵严阵以待，

使沙俄感到，即使打起仗来，他们也不一定会胜利，那样既丢了伊犁也丢了许多在华利益。

英国与俄国在新疆长期竞争，不希望俄国在华势力过度膨胀。清政府拒绝《里瓦吉亚条约》符合英国利益，但不希望中俄开战，英国对华贸易占它整个对外贸易的75.5%，如果发生战争，必然会使英国受到严重影响。

法国也不希望发生战争，因为中俄战争会使俄国将兵力从欧洲调向中俄边界，从而放松了对法国宿敌德国的牵制。

曾纪泽了解到这些情况，就巧妙地利用英、法、俄三国之间的微妙关系，借助英、法制造舆论，使当时国际舆论都倾向于谈判桌上解决中俄争端，使俄国感到无形的压力，不愿招来各国的不满，同意接待曾纪泽，重订新约。使事情向着有利于中国方面发展。

曾纪泽的第二步工作是仔细研究有关伊犁问题的资料，确定谈判的具体方案。

曾纪泽找来有关伊犁地区所有地图、资料，中俄有关伊犁交涉的文件，仔细研究了伊犁的历史和地形地貌。经过反复的思考，他认为这次谈判主要在划界、通商、赔款三个方面进行。在三方面中权衡利弊（bì），划分边界是最重要的，边界一旦划分将永久不变，因此应当特别慎重，并当全力以赴，百折不回地争得利益。通商条款次于划界，因为通商条款可以随着形势改变，只需要将中国权益过分丧失的部分加以修改。与前两条相比，赔款所占份量最轻，如果更改边界对中国有利，只能对赔款适当增加。深入研究了谈判内容，曾纪泽对谈判的结果大致有了估计：“此事纵办得顺遂，大约界务稍有更改，则兵费不能不加。商务系俄人所最看重者，必不能全行驳改。”经过曾纪泽的多次反复说服，清政府基本确定了收回伊犁、酌情允许通商、增加赔款的方针。其目的就是在对俄国作一些让步的基础上，减少损失，收回伊犁全境，换回部分主权。

曾纪泽的第三步准备工作是尽量减少谈判的障碍。

曾纪泽建议清政府对崇厚的治罪不要太重。因为“惩使愈重，则辱俄愈甚，改约愈难”。谈判的目的是争取改约，而缓和中俄之间过于紧张的关系，有利于在谈判中掌握主动权。清政府听从了曾纪泽及英、法等国的建议，在曾纪泽到达俄国之前，将崇厚“暂免斩监侯罪名，仍行监禁”。为中俄谈判扫除了一点障碍。

曾纪泽授命于危难之际，可是他勇于克服困难，在短短的三四个月中，积极筹划谈判准备，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为他最终出色地完成使命奠定了基础。

对于曾纪泽出使俄国谈判，总理大臣们没报太大希望。他们承认，曾纪泽赴俄改定条约的谈判难度超过崇厚数倍，即使总理大臣处理该事，也未必得心应手。因此，在曾纪泽赴俄谈判出发前密电他：假如谈判不顺，可以暂缓讨论，待以后再商议。可是曾纪泽并不同意，他认为，这样做俄国也不会默然的废除《里瓦吉亚条约》，并且对中国不利，中国重兵屯在伊犁边境，进退不能，边界一天定不下来，国防就一天不能稳固。主张在通商条款上酌情让步，争取收回伊犁全境。他满怀信心地赴任，曾给即将离任的公使邵友濂写了一首送别诗，表示自己“仓卒珠盘玉敦间，待凭口舌巩河山。”曾纪泽知难而上，是何等伟大的爱国精神！后来在谈判改定条约的日子里，他就是凭着顽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挽回了部分损失，维护了国家利益。

1880年7月，曾纪泽带领一行人到达俄国。到俄后的第一件事，是向沙皇递交国书，以便确定他的驻俄公使地位，然后才能开展重订条约之事。俄国对曾纪泽的到来态度冷淡，俄国外交部长格尔斯对递交国书一事，直拖了两个星期才安排曾纪泽与沙皇会面，与接待崇厚相比差之千里，可是曾纪泽并不放在心上。

作为外交官曾纪泽不仅谨言慎行、不卑不亢，而且还思维敏捷，能言善辩。

中俄双方代表在初次会谈中，俄外交部长格尔斯、驻华公使布策等人“面冷词横”，用带着轻蔑的神情说崇厚是“特派头等使臣，全权使宜行事”，你曾纪泽只是二等公使，不称全权大臣，那么“头等所定，岂二等所会改乎？”俄代表用这样的语言拒绝与曾纪泽商谈。曾纪泽义正词严地回答：“使臣无论头等二等，均无可以故违其国家之意而专擅自便者。订约必俟批准，自是天经地义。”布策等人被驳得哑口无言，又开始历数中国加罪崇厚，增兵设防都是错误的，声称“势难再议新约”。对于这样的开端，曾纪泽早有准备，他料到会谈开始肯定要为难他一番，但只要不卑不亢，据理力争，和平改约是能够实现的。

曾纪泽善于在艰难的谈判中灵活地运用策略，以重订条约减少损失，侧重边界问题为原则。

在会谈之初，曾纪泽了解到俄国认为中国对崇厚治罪，是“引为大辱”，以后将崇厚的罪由“斩监候”减轻为监禁，“疑为暂缓论决，更不满意”。曾纪泽感到赦免崇厚的罪名，与他谈判能否成功密切相关。为了能在谈判之初营造一个较好的气氛，他在三天内三次电告总理衙门，清朝廷准许赦免崇厚。8月12日，清政府宣布将崇厚免罪开释，顾全了俄国的颜面，对会谈起到了作用，俄国同意正式与中国就《里瓦吉亚条约》的修订举行会谈。

在正式会谈之初，曾纪泽没有把在国内与总理大臣们商议的改约条款和盘托出，他想了解俄国对和谈的真正意向后，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谈判。因此对中国改约的内容中最重要的，也是谈判起来不容易达成协议的内容全部提出，比如：全部交还伊犁；塔城、喀什噶尔边界按照原来的边界划分；领事只能增加嘉峪关一处等。但是在措辞上有的地方稍有改动，比如：塔城和喀什噶尔边界，虽然照原来的划分，如果确实有不能确定的地方，两国派官员去勘察确定。对于有些内容，在国内商量时没有涉及的，为了有利于谈判，曾纪泽就自行添上，比如：俄国在《里瓦吉亚条约》中侵占伊犁以西等地是为了安置移民，曾纪泽就提出准备与俄商量安置移民的方法。另外，还有许多运用灵活的策略的地方，比如：有的改约内容，在开始会谈时暂时不提出，而笼统的以“其余小处，应俟大端商有头绪再议”，而埋下伏笔。

尽管曾纪泽很有策略地提出了中国对修订条约的意见，格尔斯等俄方代表还是非常不满意，说：“如此是将从前之约全行驳了。”8月25日俄政府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新的对华政策，会议确定三条原则：一，保持《里瓦吉亚条约》的基本原则，只能就其中的部分谈判；二，俄国可以放弃特克斯河流域，但中国必须增加赔款或调整另外地区的中俄国界；三、坚决要求中国人尽快了结一切争端，限一个月内结束谈判。谈判一开始，曾纪泽就陷入困境。格尔斯指责说：先前派头等钦差签订的条约，中国都不重视，这样的行为使俄国难堪而且受了损失。因此，拒绝和曾纪泽谈判，另派布策到北京直接与清政府谈判。沙俄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给“中国政府一个教训，是对

它拒绝批准在这里缔结的条约的惩罚”。于是，沙俄单方面中断了彼得堡谈判。

沙俄的行为，给曾纪泽在俄谈判增加了新的困难。当时，清政府得知布策要到北京谈判，惊恐万分，他们最怕那些带着枪、坐着船直接到北京的外国代表，中国的官员是“谈洋色变”，列强们看准了清政府的致命弱点，就用这点来进行威胁，使清政府妥协。果然，清政府为了达到在俄进行谈判的目的，大大降低条件，指示曾纪泽，只要与俄国议定的条款内容在《里瓦吉亚条约》的十八条之内，将来报奏清政府就能批准。而这样一来，使曾纪泽原来设想的通过谈判收回伊犁全境及尽量减少中国损失的初衷难上加难。

曾纪泽的坚韧不拔精神，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品格在这场艰难的谈判中充分显示出来。

1880年9月，曾纪泽到俄外交部要求召回布策，并让俄放心“但有可让之处，我必酌量相让”。看到曾纪泽的新姿态后，俄外交部官员热梅尼认为“侯爵（指曾纪泽）和他的政府确实有和解的希望”。陆军大臣米留金也认为：“清政府真是被我们的作战准备和外交家们的建议吓坏了，非常愿意在彼得堡结束谈判，并赋予曾公使以最广泛的权力，只求不把谈判移到北京。”俄政府见对清政府的讹诈奏效，就同意召回布策恢复彼得堡谈判。

10月，中断了2个月的谈判复会，沙俄代表非常清楚曾纪泽的处境，不时地以曾无缔约全权，派使者到北京谈判作为讹诈手段，妄图使曾纪泽屈服，作实质性让步。在这种情况下，换回已失去的权益，谈何容易，每谈一步对他都是巨大的考验。

首先谈判的是划界问题，这也是诸问题中双方分歧最大、争议最多的问题。

根据《里瓦吉亚条约》，俄国将得到霍尔果斯河以西、特克斯河流域以及额尔齐斯河流域的斋桑湖以东地区，使伊犁成为三面环俄，难以守卫的孤城。这次曾纪泽要争的，是伊犁南部的特克斯河流域。布策首先提出，不能白白交还伊犁，要以“相抵之地”作补偿，逼问曾纪泽“中国沿海地方何处可让”，热梅尼也屡次提议“应由中国设法补偿”。沙俄强占了中国领土，交回时还要中国补偿，真是典型的强盗逻辑。曾纪泽坚决反对割让沿海土地作为沙俄交还伊犁的补偿，只同意让伊犁西边的一些地方酌情让给俄国以便安置从伊犁迁出的居民。俄国代表见曾不肯退让，就使出惯用伎俩，声称如果曾纪泽拒绝，那么谈判只好停止，改由俄国驻华代办凯阳德在京与总理衙门交涉，等一个月期满，将命目前在日本海指挥着23艘军舰的俄海军上将勒索夫斯基到北京会同凯阳德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并且还气势汹汹地威胁说谈判“若再迟延，不如打仗”。

面对强盗们赤裸裸的威胁，曾纪泽不失外交家的风度，既态度平和又语气强硬地说：“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倘不幸而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俄一战。中国人坚忍耐劳，纵使一战未必获胜，然中国地方最大，虽十余年亦能支持，想俄国不能无损。”沙俄想利用交还伊犁进行敲诈的计划落了空，也不得不缓和了对曾纪泽的态度。

曾纪泽在谈判中还表现出思维敏捷，善于利用机会为国争得利益。

他与格尔斯的谈判，开始时强调帖克斯川盆地（伊犁南面）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当格尔斯接受了他的要求后，他又列举其它3项，如嘉峪关设领事、松花江行船等也说是极重要的。当被布策拒绝后，他利用格尔斯在谈判喀什

噶尔划界时不接受他提出的“原定界限，不必改，无定界处，由两国分界大臣勘定”的建议，而提出要缓商这段划界的事实，立即要求，如果喀什噶尔划界缓商谈，松花江行船事也应缓商量，并援用互惠互利原则，周旋于格尔斯和布策之间，随时寻求空隙，相机反驳。最后，格尔斯允许将松花江行船专条撤废。

整个谈判过程，基本符合原来曾纪泽预期的结果，尽量挽回我国领土、主权，适当增加对俄的赔款。

在谈判赔款问题时，曾纪泽不轻易松口。俄国提出要中国赔偿兵费 1200 万卢布，（崇厚签约时提出赔偿 500 万卢布）曾纪泽坚决拒绝赔偿这笔巨款，说：“倘要 1200 万卢布，中国情愿打一仗，再出此款。”又说：“中国与其无故出此巨款，不如打仗。”并且欲擒故纵地说：“与其出巨款，不如不要伊犁。”双方经过一个多月的争执，最后赔偿 900 万卢布。

谈判的最终结果，远远超出清政府的预料，不仅收回了伊犁南面战略要地和其它土地约 5 万平方公里，还减少了在喀什噶尔，塔城的边界损失和删除部分崇厚签约的通商条款。

为了使谈判结果最大限度地益于中国，曾纪泽可以说做到了呕心沥血。众所周知，外交无小事，尤其在两国谈判时，面对面地争得利益，稍有不慎就会丧失权益。曾纪泽深知责任重大，不敢有一丝松懈，他认认真真地对待每一次具体会谈。

在谈判伊犁、塔城和喀什噶尔边界时，他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所有中俄有关这段边界的界图，经过反复地研究，做到胸中有数，避免了在决定界址时发生错误。中俄伊犁条约大纲基本确定后，曾纪泽又在各条款内力争加入有利中国的详细字句，比如：中国应付俄国赔款折合英镑的汇率；从中国汇到俄国的汇费问题；赔款中请由中国给票折付商货的问题。他还对条款内的一字一句，悉心斟酌，力求明确翔实，以预防将来履行时可能发生的流弊。因为伊犁条约以法文为正本，他就亲自督导工作人员，仔细地校对。当时中国驻俄国使馆的工作人员不够，他不顾谈判的疲劳，亲自誊写汉文本的条约大纲。

曾纪泽在谈判过程中，既有态度强硬之时，也有语言风趣之时，比如他对重新订约是这样比喻：“一张白纸已涂了墨，现中国另换一张纸写字。”对于谈判中一些细节问题，布策坚持不同意时，他笑着对布策说：“有许多事原来没有多大关系，可是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只是看表面。比如喝咖啡时，或有人先放牛奶，后斟咖啡，在明白人眼里没有什么区别，而固执的人，就以为大错特错了。”这番话说出后，布策也不由得笑了。

对于曾纪泽的外交才干，与他谈判的对手也不得不叹服。热梅尼说他“甚为骄傲，且对一般政治，甚为通晓”。格尔斯这位俄国的外交部长，自称从事外交活动 42 年，对曾纪泽的评价很高，说这次改约“实在是最难的事，而贵爵商议办理这件事，竟成功了，可见贵爵才智兼优能办大事”。他不仅称赞曾纪泽办事谨慎的态度，还说他的才智“不仅在中国出众，在欧洲也是少见”。

曾纪泽以他的聪明才智、坚韧毅力、严谨作风和报效祖国之心，奠定了他在外交界的位置。

五、中法越南交涉

1883 至 1884 年法国侵略越南引起的中法越南问题交涉，是曾纪泽外交生涯中面临的第二次考验。如果说中俄伊犁谈判给他带来了较高的声誉，中法交涉却由于清政府的妥协退让给他带了屈辱和失败。

越南与中国唇齿相依，两国的关系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越南曾是中国郡县之一。在几千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越南时而是我国版图下的郡县，时而是定期向朝廷纳贡的藩邦。清朝乾隆以来，越南定期向清廷纳贡，4 年一次。随着清朝的没落，西方列强把瓜分矛头对准中国，法国首先把触角伸向中国的藩邦越南。

19 世纪最后 30 年，随着法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法国统治者开始向外推行殖民政策。两次组阁的右翼共和党头子茹费理曾露骨地叫嚷，要在亚洲建立“法兰西东方帝国”，因此“必须征服那个巨大的中华帝国”，为此“我们就必须站在那个富庶区域的通路上”。这个富庶地区的通路，就是与中国山水相连的越南。

1862 年 6 月，法国占领了越南南圻（南部），并强迫越南签订了《西贡条约》，接着开始觊觎北部。法国侵略者毫不掩饰地称：“必须占领北圻，……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这个军事基地，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到达中国腹地的人。”由此看出，越南不过是法国的跳板，其真正的侵略目标是中国。

面对法国的严重侵略威胁，越南国王请求当时驻扎在中越边境保胜地方的太平天国余部刘永福的黑旗军进驻河内，协助越南抵抗法军。由于越南国王的软弱，1874 年在法军的逼迫下，法、越签订了《顺化条约》，即《法越和平同盟条约》，宣布越南独立，法国成为越南的保护国，对越南同其它国家缔约的权利进行了限制。

为了肃清中国在越南的影响，确立法国的保护国地位，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在法国政府的授意下，要求中国撤退入越剿匪的桂滇军队，并要求在红河的上游、中国云南境内，开放内河口岸一处，以备法人通商。

清政府虽然拒绝了法国通商越南、撤退在越军队的无理要求，但对于《法越和平同盟条约》及法越之间的条约关系，并未直接了当地予以否认，而仅以委婉驳斥的立场，声明越南系中国的属国，这一点为法国占领越南、否认中国对越国的主权制造了一点借口。随着法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法国在越南的活动日益猖獗。

曾纪泽虽然远在英法，但对法国图谋越南的企图早有耳闻。1880 年 1 月 25 日，曾纪泽面见法国外长佛来西尼，申明越南系中国属邦的事实，但佛来西尼否认法国对越怀有任何领土企图。1880 年 6 月，曾纪泽致函总理衙门，要他们采取措施，防止突发事件，要防患于未然。不久，曾纪泽奉命赴俄，而此时法国对越政策，由于对外扩张分子茹费理（1832—1893 年）继任总理，更趋强硬。当时曾纪泽尚在俄京彼得堡忙于伊犁问题的交涉，但他对法国的动态仍极为关注。1880 年 11 月 10 日照会法国外长桑迪里质问法将派兵赴越消息是否确实？并严正声明：“倘该国有紧急紧要事件，中国岂能置若罔闻。”

法国对曾纪泽的抗议，明确表示不同意，否认中国在越南的宗主权，他们公然叫嚷：法国在越南所为，是按着法越间条约行事，……越南受法国保护与北圻问题与中国无关。曾纪泽在中俄紧张激烈谈判间隙，带病前往法国

驻俄使馆，再次重申：法越条约宣布越南独立与中国有关，早在 300 年前越南隶属中国版图，稍后被中国封为属国，自理朝政。法国虽与越南订约，但中国的宗主权利尚在。与此同时，他建议总理衙门，应向法国声明中越宗属关系，以阻止法国在越南的进一步行动。若果真发生争执，即可以此为据，与之说理。

中俄伊犁改约签订后，中国在国际间的声望大大提高。1881 年曾纪泽回到巴黎，想乘机就越南问题与法国作认真谈判，主张改以强硬立场。曾纪泽会晤法国外长，法国仍坚持法越订约的原来立场。他深知：“法国图谋越南，蓄谋已久，断非口舌所能挽救。”因此曾纪泽再度致电总理衙门，提出了挽救越南局面的七项建议：（一）中国对越南施加压力，越南除定期派遣进贡使臣外，要派一明白事体的大臣长住京师，听候吩咐。（二）越南系中国属国，按规定不得擅自派遣使臣驻扎他邦。（三）告知越南，切不可与法国轻立新约。（四）遵守执行中国命令而非依据法越条约行事，在红河开埠通商，允许西洋各国来此通商贸易。（五）越南清除红河盗匪，力不从心，可求助于中国，勿求助于法国，给法国造成可乘之机。（六）法越条约，西洋各国并未承认，实为废约。（七）越南应对臣民严加管教，防止给法国造成挑衅借口。

曾纪泽的目的，是想通过对越南的控制，加强中越的宗属关系，排挤法国势力，阻止法国侵略计划的实现。凭着曾纪泽多年的外交经验和对国际形势的了解，他的建议是符合实际的。李鸿章为首的妥协派对曾纪泽的七项建议都不赞同，他认为越南政权“弱不能扶”，而法国也并不急于吞并越南，法国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因此，他坚决反对采取积极主动的防范措施，而主张采取审慎观望的态度，静观事态的变化。

1882 年春，形势急转直下，法国借口越南应依法越条约开放红河通商，一面要求越南驱除刘永福的黑旗军，一面派海军上校李威利率援军 700 人，进驻河内，并于 4 月 8 日攻占河内。

曾纪泽在巴黎报纸上看到了法军攻占河内消息的当天，即提出口头抗议，声称法国如果侵占越南的土地，中国必定干预。4 月 15 日，曾纪泽三度会见佛来西尼，要求法国在越南的行动应与中国商议。佛来西尼不但拒绝，而且狂妄地宣称：法国在越南所为，是根据法越之间条约所为，中国无权干涉，法国也没有义务报告中国或与中国商议。曾纪泽听后，非常愤怒，他要煞一下法国佬的狂妄气焰，于是在 4 月 29 日，曾纪泽向法国提出一件措施非常锋利而语言极为直率的照会，列举中国有权干预越事，及中国对越事不能不加过问的理由，驳斥佛来西尼的答复为“无凭之说”。他指出：所谓越事不关中国一词，可谓毫无根据。作为主权国家，中国历史悠久，与越南紧密相连，连绵数千里，在越南土地上居住的华侨，为数众多，两国间的贸易比越南与任何国家的贸易往来都广泛，中国所有西南地区的物产，都由越南水路行销，中国和越南如此关系，您认为中国没有法越事件关注的权利，请问阁下，贵国更有此资格和权利吗？

法国借口曾纪泽发来照会措辞傲慢，而且有轻视侮辱法国的语句，搁置不复；曾纪泽再度致函，但也仍无下文。法国驻华公使宝海威胁总理衙门大臣说：如果曾纪泽对于法国不改变其傲慢的口气，法国外交部对此类照会，将拒绝不收。

法国的抗议，引起了国内清廷主和大臣的恐慌，他们一味指责曾纪泽办

砸了事，有失国家体面，导致中法关系不睦。曾纪泽毫不退缩仍坚持强硬的对法立场。但他对法国不复中国的照会非常愤慨，态度更强硬。在同继任法国外长杜克莱的一次会谈中，请法国外交部设法预防法国某些驻越边将，不顾法越相距甚远，在越生事，同时又说明，中国不但有权关心越南边界的地方，而且对越南内地，也很关切。在另致总理衙门的信中，指责法国对他敷衍塞责的用心和伎俩进行了抨击和嘲讽，称之为儿戏，幼稚可笑。

由于曾纪泽强硬的对法态度，使法国人既恼怒又害怕，深知从曾纪泽身上法国是占不到任何便宜的，因此不予理睬曾纪泽，而把中法交涉的重心转移到北京，由法国驻华公使宝海与直隶总督李鸿章交涉。

李鸿章对越南的政策，自始就与曾纪泽有重大分歧。他对法国的侵略，“始终主和”，“坚持和议”。其理由是：（一）如果中国与法国开仗，就是与法国“失和”，而中国一向“兵单饷匱”，决不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二）中国若与法国开仗，即使“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即使偶尔打了胜仗，也只会引起法国的更大报复；（三）即使法国吞并了越南也不过是“伏边患于将来，”假若因援越而得罪了法国，就要立即“兵连祸结”，动摇全局。这是地道的失败主义与民族投降主义。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李鸿章在中法越南交涉之初，就主张牺牲越南，对法妥协，反对与法国兵戎相见。虽然后来由于法国的一再挑衅，中国政府增兵入越，派广东兵船在越南洋面游弋示威，李鸿章不过是想藉此威胁法国，并不想进一步交战，故而谆谆告诫入越将领“相机因应，不可轻率从事，衅自我开”。即使在中法交战甚为激烈时刻，李鸿章也无时不在寻找与法国和解谈判的机会。

李鸿章的避战求和，助长了法国的侵略气焰。法国侵略者一面派人与李鸿章进行谈判，乘机要挟恫吓，一面派大批海陆军到越南，加快了发动侵华战争的步伐。

1882年11月，宝海与李鸿章签署《宝李协议》，双方在不谈对越宗主权与保护权的前提下，中国应先自越南撤兵，中法以红河以北为界，北圻由中国保护，南圻由法国保护。因宝海力主在红河以北划界，李鸿章未予坚持，并认为中国在越南的界限，实在不必向南伸展太远。尽管《宝李协议》中国丧失部分权利，法国政府借口该协议与法越条约条款不符，将宝海撤职，另派驻日公使脱利古来华续商。同时，增拨军费，制定侵略计划。

在宝海与李鸿章谈判之时，曾纪泽也另觅途径，以期打破他在巴黎所面临的外交僵局。由于英国不愿意因英国干预越南问题而导致英法关系恶化，因此拒绝就中法问题调停，曾纪泽寻求英国帮助中国、限制法国的计划落空了。为了阐明宝李协议中中方的立场，曾纪泽接见了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将中国对越南的现行政策归纳为三原则，即中国保护越南，是把越南作为中国南界与法国之间缓冲地带，用以杜绝中法之间直接武力冲突；若法国想驱逐黑旗军而占地通商，则事先必与中国商议；中国与法国分护越南，中国不放弃对越南的保护权。等到法国单方宣布废弃宝李协议，并将宝海撤职，曾纪泽与法国和平谈判的希望已经落空，他深信法国派宝海谈判，只不过是一场骗局，目的是延宕中国对越的军事布置。他也认定此后中国应付越南局势唯一有效的途径，只有采取武力政策，以胁迫法国自动放弃吞并北圻的企图，或迫使其与中国议商和平解决的其它方案。他反对中国再与法国作任何认真的谈判。

曾纪泽在对两国的军事实力和国际形势的分析后，提出中国应坚持“备战求和”的战略方针，他说：法国垂涎我国南部，为时很久了，无论政客，还是商人，从未忘过。……我国果真能以实力抗争，他们就会退缩，如果再姑息纵容，仅以空洞的言论与之抗争，恐怕今年之内东京就不归越南所有。仔细考察一下法国的财力，实际并不富裕，法国与德国、意大利二国关系不和，常常有所顾虑。越南距法本土甚远，劳师动众，筹措兵饷，尤其不易。法国占据越南的西贡，那仅是一块贫瘠之地，若果真与我们交战，此地也难长久据守。中国近年海防加强，抵抗联合的各国，兵力不足，如果专门对付法国，则绰绰有余。法国占领越南，若派兵二万，即要倾其全力，中国说不定不用开战，就能胜利。一战失败，可重整旗鼓再战，则法国无法做到，中法若能相持一年，法必然失败。……况备战未必真导致战争！这就是所说的备战可以求得和平，而一味追求和平则必导致战争。

曾纪泽对“备战和平”与“法越之事的分析都是很正确的。事实上，极力主张武力侵占越南的茹费理政府地位并不稳固，法国可以用于远东的兵力也很有限，在外交上法国的处境也很孤立。如果中国能积极援助越南，准备作持久战，“坚持不让之心，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则法国未必敢于冒险。但此时李鸿章为首的清政府一味惧战，及至法军攻占越南首都顺化，强迫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公开宣布越南全属法国，李鸿章仍然极力主和，并以“各省水旱频仍，元气未复，饷力艰窘，罅隙实多”等理由，进一步主张放弃越南。主和派们不仅仅对战争，还把坚持抵抗的曾纪泽视为与洋人妥协的障碍，国内同事和朋友中也有些不明真相的人，责备曾纪泽“一意主战，以国家为孤注”。曾纪泽却始终坚持他的正确观点，为中国权益在坚持不懈地奋斗着。

脱利古与李鸿章开始谈判后，脱利古骄横无礼、狂妄自大，声言不惜对中国开战，李鸿章被其威胁吓破了胆，马上否认中国曾帮助越南抗法，也未曾支持刘永福拒法，并电告总理衙门，不可轻言战事。初次谈判由于双方差距过大，毫无结果。法军占领顺化后，又向李鸿章提出重新分界等主张，由于该建议导致中国丧权过多，清政府予以拒绝。

由于法国外交部对曾纪泽采取既不复照会，也不与之谈判，置之不理之态度，曾纪泽为阐明中国原则和立场，不时接见外国记者，阐明自己两年来坚持的对越政策要点，警告法国，如果不听中国劝告，誓将冒中法战争的危险。

1883年12月，法国议会通过2900万法郎的军费和再派1.5万名远征军的提案，“决议夺取山西、北宁，将不与中国谈判”。在此情况下，清政府也被迫调兵遣将，积极备战。命两江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李鸿章分办南北洋防务，命滇督岑毓英督率防军驻扎北圻，中法越南战争一触即发。

中法越南领土上武力对峙严峻时候，曾纪泽认真考察了中法双方在越南的兵力部署、部队装备情况，提出应采用持久战战术。他说：现在法国认为我们武器装备差、军队没经过西方式的正规训练，肯定经不起，一战就会跨掉、失败，因此他们想试探一下虚实，仅用军舰十几艘，士兵万人就来到东方。如果我们被他们以威胁吓倒，不战即退，则刚好遂了法国的心愿，这岂不是亘古未有的一大遗憾。况且不是让一下就能了结的，其它各国企图占领中国其它领土或属邦的事情就会接踵而来，中国如何招架呢？像法国这样内部混乱、外部孤立的侵略者中国都不能抵抗，何况英俄等强国呢？此次中国

不顽强御敌，振兴祖国，则我们中华民族就没有自强之日了，每每想起这些，悲愤无比，感慨万千。

1883年12月11日，法军6000人在法国远征军总司令孤拔率领下，对协助越南抗法的清军和黑旗军发动进攻，清军统帅因感到清政府对战争态度不坚决，失败则有罪，胜利也不嘉奖，弃军而逃。黑旗军代守5天，因众寡悬殊，山西失守。紧接着河内、北宁、顺化等失陷。

法国侵略者因占领山西兴高采烈，竟恬不知耻地说：“色当被山西掩蔽了。”意为山西之战的胜利，弥补了普法战争中法国在色当一役的失败。曾纪泽在致德国报社函中，公开将刘永福军在山西的败绩与普法战争中色当一役法皇被掳、法军全军覆灭的大败溃相对比，对法国的得意进行辛辣的讽刺，法国朝野一致认为是对法国国家最大的侮辱，法国国会纷纷主张要倾全力抵制曾纪泽强硬政策，要将这个法国既恨又怕又无可奈何的驻法公使赶出法国，不允许他散布对法强硬、抵抗法国的言论，不许他损害法国的伟大形象。因此，当清政府因战争初期失利吓得惊慌失措，派李鸿章寻求和解的时候，法国特别声明：“曾纪泽一日不调离他驻法国公使的职务，法国就一日不与中国商议越事。”还攻击曾纪泽在巴黎办事，“于法国国家命意所在全无知晓”，……只是时时狂妄地用中国将对法开战相威胁，致使中国战场上失败而失去体面，向法国求和。

法国对曾纪泽的凌辱和疯狂进攻，使本来内忧议和，外抗敌廷，终日焦灼的曾纪泽心力交瘁，致使他咯血数日，染病在身。他自己也称，如果法国人再肆意诋毁他，则病情必会加剧而不可救药了。

即便如此，曾纪泽每日拖着虚弱的身躯积极活动、四处奔走，丝毫不敢放松工作，时刻为维护中国的权益而斗争。他担心朝廷主和思想占上风，极力说服朝廷坚持对法持久作战，他坚决反对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同法国议和，但是清政府已决心与法国言和，不仅不采纳曾纪泽的建议，而且为了达到议和的目的，甚至答应了法国提出的苛刻条件：放弃越南，撤销曾纪泽驻法公使职务，改以翰林院侍讲许景澄接任曾纪泽，未到任之前，由使德大臣李凤苞兼任。

一片忠心反遭到如此打击的曾纪泽，悲愤交加，“寝馈难安”，双手颤抖得连字都写不出来，他终于病倒了。

1884年5月11日，中法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约》（又称《李福协定》），清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中国同意在中越边境开埠通商等等。曾纪泽同法国侵略者抗争多年、奋斗多年的中国权益，被清政府一纸合约葬送了，法国侵吞越南，窥伺中国边境的愿望实现了。

果然不出曾纪泽所料，法国并不以占据越南为满足，《简明条约》墨迹未干，法国就出兵“接收”谅山。中国守军奋起自卫，打退了法军，法军以此为借口要挟清政府。接着，法国船队开入马尾港，水师统帅秉承政府意旨，“严令水师不准先向法国开炮，违抗者虽战胜法国也当斩首”。结果法舰突然开火，11艘清舰毫无准备，全部被击沉。在全国不满和指责下，清政府于8月26日下诏抗法。1885年春，镇南关——谅山大捷中国胜利的消息导致茹费理的垮台，但清政府却“乘胜即收”，匆忙同法国达成停战协议，重申《简明条约》有效，6月9日中法签订《会订越南条约》，正式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中国是“不败而败”地失败了，曾纪泽的外交政策，外交思想没能得以最后实现。

六、中英鸦片税厘交涉

中英鸦片税（关税）厘（厘，税的一种）交涉是指中国要求英国提高输入中国鸦片进口关税而与英国进行的谈判。早在曾纪泽接办该项谈判之前中英已进行过多年磋商、谈判；1883年4月6日，他才正式奉命与英国商谈，至1886年7月16日，谈判告一段落，由曾纪泽与英国外相沙里斯伯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将有关鸦片税厘问题，作一初步解决。

西方列强曾用鸦片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导致鸦片战争的爆发，为抗议鸦片的输入给中国带来的无限灾难，中国人民曾进行过反对鸦片的坚决斗争，但是，清政府所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不仅没有阻止鸦片的输入，相反鸦片在中国日益流传并合法化。《南京条约》虽没有直接提到鸦片问题，但鸦片贸易已等于弛禁。1858年中英签订的《通商章程》，明文规定“洋药”（鸦片）税额，每箱应纳进口税银三十两；这样鸦片从此公开销售，吸食鸦片的人也日益增加，整个中国鸦片的消耗量急剧上升。由于鸦片可以获取高额利润，四川、云南、山东一带民间也种植罂粟（yīng shù）销售，一时间鸦片销售直线上升。仅英属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1865年到1868年平均每年达7.57万多箱，1881年到1884年平均每年上升为8.13万箱，从朝廷大官到平民百姓，从成年长者到不更事的小孩，吸食鸦片已非罕见，造成极恶的后果，因此，无论清政府还是地方当局，都深感烟毒问题的严重，任其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国家如何自强？在一些禁烟派主张下，1856年清政府下令严禁各省私下种植罂粟。这一措施并未触及洋人大量输入的鸦片，无法解决鸦片带来的祸患。

当时，以中国驻英国公使郭嵩焘为首的戒烟派，力主严禁鸦片，只有禁止洋烟对华输入才是控制鸦片流毒的有效办法。清政府因此命郭嵩焘就鸦片问题与英国政府谈判。

鸦片贸易给英国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英国是绝不肯放弃这种利益的，根本就不同意中国禁烟。虽然早在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中，英国承认中国对于“洋药”可以税厘并征，并在同意其它条件下，英国还允许通过国际协定准许中国增税，但事后多年却以种种借口，迟迟不批准该条款。《烟台条约》虽规定进口鸦片“一并在新增开口岸交纳税厘”，但对税率和厘捐的数额，并未做明确规定。既然各口岸及内地关卡可以对鸦片税厘并征，鸦片的买卖与吸食，实际已间接地变为合法。就当时清政府的腐败和妥协政策，完全彻底地禁止鸦片输入是不可能的。因此，当时中国的初步目标，只是在促使英国实现《烟台条约》同意对鸦片提高税额，通过提高洋药的价格，逐步达到禁绝烟毒的目的。

首先，由郭嵩焘与英国外相沙里斯伯谈判，郭嵩焘提议，进口鸦片每箱百斤除原来规定的正税外，再征厘捐60两银。税厘合计90两，没有结果。1881年夏，军机大臣左宗棠与英驻华使臣威妥玛继续商议，李鸿章建议税厘合征每箱120两，左宗棠则强调鸦片遗害无穷，主张加重征收，除150两为原税外，由自己国家自办厘捐。威妥玛坚持每箱除原税外，只能加厘50两。双方意见相距甚远。李鸿章以税厘过重，势将导致漏税为由，降低税厘数额到110两，威妥玛刚开始坚持厘税总额应以90两为限，见李鸿章做出让步后，马上又提出印度鸦片要由中国全部统收，中国将入关的洋货一律加税

免厘等无理条件，使谈判无法进行。

曾纪泽在此次谈判中充分展示了娴熟的谈判技巧和卓越的外交才华。他抵达英国后，并不急于和英国谈判、急于求成，而是广泛接触各界人士，随时随地将鸦片的毒害作用，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中国政府禁烟的用意向有关人士解释。尤其是与英国禁烟会的人士经常打交道，并于1879年2次致函该会，对该会致力于扑灭鸦片毒祸，维护正义与人道的崇高原则，表示钦佩。他在禁烟会的集会上，控诉鸦片罪恶，及给中国百姓带来的恶劣影响。他还对某些英国人散布中国有3百万人食鸦片、对整个社会影响不大的谬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驳，阐明，“吸者虽少，受毒甚深”，因此全国人民都对鸦片切齿痛恨。曾纪泽的活动，在英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博得了禁烟会的同情，禁烟会甚至还专门致函李鸿章盼望中国早日肃清烟毒。

在痛陈鸦片的祸害时，曾纪泽明确表示并不主张马上全部禁绝鸦片，因为这要使英国受到巨大的损失，因此主张缓禁。这样曾纪泽感情上、舆论上赢得了英国人的好感，为下一步顺利谈判奠定了舆论基础。

鉴于清政府一向害怕洋人找各种借口，挑起事端，进而要挟中国，曾纪泽与英国下议院（决定战和问题）议员们广泛接触交往，并确信英国的官员，只能凭口舌与中国争论、谈判，决不可能因此而寻事挑衅，进行武力威胁。

在谈判的原则上，曾纪泽主张坚定立场，百折不回，不折不扣。他在致总理衙门的信中指出：西洋各国税收制度，本是各国自主权，凡是不急需的商品，不是百姓所必不可少的物品，都是加几倍征税，英国所征税以烟酒尤其重。鸦片产生的毒害之重，中国征收重税，本是名正言顺。威妥玛自知理亏，故意拖延搪塞，然而我国确定一定税额，百折不回地坚持，他能把我们怎样呢？

在谈判技巧上，中国征收税厘金额的底价不宜一下和盘托出，否则没有周旋余地。当时李鸿章在与威妥玛谈判时，已将每箱百两的底数告知对方，并答应将该价报本国考虑，使曾纪泽失去进一步抗争的余地。李鸿章还嘱咐曾纪泽，如果能使英国在百两银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更好，倘若英方不肯增加，这事也就可以敲定了。

曾纪泽仔细了解了中英税厘谈判多年毫无进展的缘由，认为，鸦片加税事情归英政府中印度大臣专管，而此事的决定权在印度总督，英国外交部无权决定鸦片税额，因此，英国不会诚心与中国就鸦片加税事件认真谈判，让没有决定权的英国外交部按照中国提出的数额了结此事，那是有困难的。

正当曾纪泽与英国外相交涉此事时候，英国大东电报公司正援丹麦北大电报公司的前例，要求在中国另建香港——上海间的海底电线，并在上海接线上陆。李鸿章则根据1870年奏准英商海底电线不得引线上陆的旧案，予以拒绝。曾纪泽则认为解决鸦片加税事件的时机来到了。曾纪泽认为，中国既已允许附有俄国股份的大北电报公司的电线上陆，如果拒绝大东公司的要求，实为“厚俄而薄英”，让英国人抓住把柄，纠缠不休。他主张不如允许大东公司的海线在吴淞口上岸，对英表示善意，由英国外交部对印度总督施加压力，以加速中英鸦片加税免厘的谈判。李鸿章对曾纪泽的如意算盘很表怀疑，认为以利润较微的电线与利润较大的鸦片税收相抵销，无异于“四两搏千斤”，但实际上曾的打算颇见效力。鸦片税厘与电线，虽然在性质上风马牛不相及，毫无关系，但在英国外交部的压力和坚持下，印度总督终于同意了税厘并征百两的原则。6年来，中国一直悉力要求英国承诺的最低目标，

总算已通过。

曾纪泽对实现最低税厘目标，并不满意，认为还可增加。因此他建议保留征收拆箱零卖的税项权利。在他不屈不挠的坚持下，英国外交部做了让步，同意每箱税厘总额为 110 两。

1885 年 7 月 18 日，曾纪泽与英国外相沙里斯伯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规定每箱进口鸦片于交纳正税 30 两外，另交厘金 80 两；并在条约中说明，行销“洋药”之事，“须有限制约束之意”。但“洋药”在内地拆包零卖时，仍可比照当地商品收税，另征厘捐。

由于《续增专条》，英商自印度输入中国鸦片平均数额每年以 7.78 万箱计算，中国税收每年可增加 620 余万两。中国因此得以用该款的一部分，向英国购买 3 艘海上巡逻船，分别命名为“开办号”、“厘金号”和“专条号”，以示纪念。

曾纪泽此次中英鸦片加税免厘交涉的最初目的，是通过加重英国输入中国“洋药”的税源，以达到逐步禁通鸦片的流毒，并增加中国的收入，进而想运用间接的方式，以确定英政府对于中国烟祸蔓延的道义责任，并运用两国间的条约的明文规定，从禁止外人输入鸦片入手，以彻底解此问题。因此这次谈判仅为戒烟毒的第一步，曾纪泽以他的智慧和聪明才智达到了预期目的，完成了清廷 6 年来想完成而未完成的任务。

七、归国之后

1884 年，清政府屈辱地接受了法国与中国谈判的条件，宣布免掉曾纪泽出使法国大臣职务。这对于一心为国的曾纪泽犹如当头一棒，他感到愤怒和徬徨，“数年的豪气，一朝丧尽”，为维护祖国的利益、民族的尊严倾注了满腔热血的爱国志士，不仅要遭受外人的凌辱，还成了清政府妥协政策的绊脚石，一心赶走他，再与法国缔约言和，曾纪泽感到从未有过的寒心和受辱，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尽管如此，曾纪泽仍以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继续执行驻英、俄公使的职责。两个月后，在左宗棠的极力推荐下，“曾纪泽交军机处存记”。1885 年 6 月清政府决定改派刘瑞芬出任英、俄公使，要曾纪泽“回京供职”，这样，到 1886 年 8 月曾纪泽离开英国，他的 8 年半外交生涯就此结束了。

1886 年底曾纪泽从欧洲回到北京。此时曾纪泽虽然只有 47 岁，但是离国赴欧 8 年，他日夜焦心长虑，为国操劳，不仅两鬓过早染上白发，且疾病缠身。尽管如此，他回国后深恐所受皇恩深重，无以报答，每天勤奋不倦地工作。清朝廷先任命他为“海军衙门帮办大臣”，协助处理有关海军事务，后又任命为“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户部右侍郎兼管钱堂事务”及“户部三库大臣”等要职，后来又兼“刑部侍郎”，管理同文馆。

曾纪泽在从欧洲返回中国前，为了详细了解欧洲强国的军事装备、武器制造情况，特意要求参观了英国、德国的造船厂，海军武器装备制造局，仔细考察两国造船规模、工艺，所到之处，必携带有关的技术资料，回国后，他又不辞劳苦地将他们翻译出来，以备政府所用。当时海军衙门大臣们对于海防机要、近代海军知识与技术的基本原理缺乏了解，曾纪泽虽为帮办大臣，实际上海军衙门的各项计划多出自于曾纪泽的策划。他对于海军统一建制、海军机构的设置、海军的训练、战舰的制造、武器的装备，都提出了诸多建

设性建议和意见，他满怀壮志，筹议颇多，但是处于清朝腐败昏庸的政治环境及保守势力占上风的氛围下，曾纪泽的建议多不被采纳，而且他的意见，经常受到同类的疑忌和掣肘，他们阻挠或抑制他的计划的实现。西太后将创办中国近代北洋水师的款项挪用修建颐和园后，他关于建立近代中国海军的计划落空了。尽管对朝廷的这种做法很不赞成，但他所处的地位是无法改变现实的。在任其它要职时，他恪尽职守，勤于朝政，不敢有丝毫松懈。但他的许多主张同样难以实现，他的聪明才智得不到应有的发挥，因此，他经常郁郁寡欢，闷闷不乐。因他兼职多，工作繁重，心理承受压力很大，最后竟因感冒身患伤寒，一病不起，于1890年4月12日去世，实际年龄不足51岁。

曾纪泽不愧是中国清朝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他没经过正规的外交知识学习和系统的外交实务训练，但已触及到近代外交政策的核心问题，已具备了一位外交家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了解国情、知晓世界形势、忠诚谨慎、有谋有略、机智灵活、能言善辩。他认识到近代中国对外关系根本问题，并不在于交涉的本身，而在于国家是否自强，“中国如能自强，则可以似汉唐之匈奴、西域、吐蕃，尚未能自强，则直如春秋战国之晋楚齐秦。”中国要自强，就要学习西方的科技文化，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武装自己，创立近代政治经济体制和近代工业企业，创办近代海军，抵御外来侵略。在对外关系上，面对列强窥伺中国的局面，他力主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加强中国与各藩属关系，通过加强对藩属的控制，改变中国与藩属的松散关系。他极力主张收回关税自主权，取消不平等条约，并废除最惠国待遇，还中国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面目。这些思想如实反映了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中国挨打受辱的事实和一位杰出外交家所欲追求的目标。

曾纪泽在同时期中国遣外使节中称得上是佼佼者。在他经手的三件主要外交事件中，尤以与俄国改订条约谈判表现得最为出色。在这场绝无仅有的“虎口夺食”的较量中，曾纪泽方针正确，思路敏捷，能言善辩，既坚持原则，又机智灵活，利用中国对条约内次要商务条款的让步，换取俄国对边界商务等重要条款的让步。他还非常善于利用英、法与俄国的矛盾对俄施加影响，同时利用武力与外交紧密配合，实现他所提出的解决争端的方案。这些成就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是不多见的。在中法越南交涉期间，他先主张加强中越传统的宗属关系，谋以中国的军事力量控制越南，从正面抵制法国，并利用干预越南的活动，向东西各国表明中国维护整个藩属体系的决心。如果清政府早下决心，借保护越南来保护整个藩属国家，曾纪泽的主张或许能够实现。曾纪泽在鸦片税厘交涉上的成功，结束了1876年中英烟台以来纠缠多年的一大悬案，禁绝鸦片的目的虽未达到，但英国至少在该协议中，答应将这项肮脏生意“限制约束”，为此后进一步禁烟奠定了条约基础。他在近代外交战线上取得的成就是显而易见且带来积极影响的，正如美国史学家马士赞扬他“为中国不流血的外交胜利，开创先例”，这确是公正的评价。

曾纪泽是奋斗在外交战线上的一位爱国志士。在国势衰落、妥协分子掌握外交大权的清王朝，曾纪泽为挽回国家的损失和民族利益已尽最大努力。他在侵略者面前，表现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他学习西方文化知识，但并不崇洋媚外；他成为大家子弟学习外语的第一人，是为了更好地为朝廷服务，为国家尽忠。他主张吸收西方的科技文化成果，目的是致力于中国的强大；在谈判桌上，他不屈不挠，据理力争，既不向列强的武力威胁低头，也不向

流言蜚语屈服。他所奉行的外交政策，与崇厚的昏庸卖国、李鸿章的妥协退让形成鲜明的对比。尽管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曾纪泽外交主张没能完全实现，但他为维护中国权益所进行的积极斗争，永远不会被忘记。

